

灾害短视频的拟像共同体传播:内聚焦叙事、价值转向与纪念仪式

黄 勇 军 段 梦 寒

(重庆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为揭示灾害现场亲历者如何在媒介场域通过“影像文本”将“远处的灾难”的“感知物质空间”转化为大众切身体验的“共通意义空间”,探寻中介化过程中媒介叙事手法的基本机制及其价值转向,本文聚焦于重庆山火现场及土耳其地震亲历者发布的短视频在网络社交媒体“出圈”现象。灾害亲历者以第一人称视角拍摄的短视频通过内聚焦叙事与围观者跨越时空距离进行多维度的信息、情感、价值沟通,在中介化连接与扩散过程中增强“远处的灾难”的可感知度,并寻求社会性协助与支持,在媒介的纪念仪式中实现集体记忆认同的动态协商和反思性重构,由此有助于理解普罗大众“自传记忆”零碎的经验性文本自主传播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与专业媒体的职业创作共同构建“拟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拟像共同体;内聚焦叙事;传播价值;媒介仪式;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3)03-0077-11

doi:10.19742/j.cnki.50-1164/C.230308

回顾灾害传播的叙事过程与历史呈现,媒体对灾害的复杂性及其与人类联系的内在性缺乏普遍性陈述^[1]。集体共同经历的突发性的潜在创伤事件(traumatic event)通过媒体叙事被建构为社会性的灾害想象,“将灾害叙事化为‘事件’的过程是现代社会对灾情进行理解的重要机制”^[2]。国内学者关于灾害性报道的研究一般以年代为界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3],关于灾害报道的研究内容也集中在历史溯源^[4]、理论阐释^[5]、业务探讨^[6]、媒介伦理^[7]、对外比较^[8]等方面。我国新闻传播学视野的灾害研究结合实际,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但部分研究仍停留于宏观的灾害事实表层的描述,以灾害亲历者视角关注、理解和解析灾难的研究尚存不足。

影像作为构筑灾害记忆再现机制的媒介化手段之一,在全民参与救援、全员报道场域下通过可视化的传播形式与碎片化的传播手段呈现“交互性论述”与“现代性反思”之特点。2022年8月,重庆北碚、涪陵、南川、江津等10个区县先后发生14余起森林火灾;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造成土耳其及叙利亚两国超5万人死亡。灾害亲历者以第一人称视角拍摄的大量现场救灾短视频凭借其便捷性和及时性在网络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尽管其拍摄者众夥、范式不一、手法各异、品质参差,但却呈

收稿日期:2023-03-03

作者简介:黄勇军(1974—),男,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视听传播、影视美学。

段梦寒(1999—),女,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视听传播。

基金项目:2021年度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重点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教育推动重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路径研究”(2021-GX-112)。

现出一些共同特质:抖动的镜头、倾斜的视角、杂乱的背景音等逆专业化的媒介指征结合内聚焦叙事直观性强、冲击力大等特点,迅速生成情感动员机制,引发受众共情;全主体多主题的碎片化个人记忆记录关键节点信息的同时,进本退末地传递着灾区诉求,寻求社会援助。本研究拟结合我国当下的媒介语境,以“重庆山火”和“土耳其地震”两场自然灾害为案例,探讨灾害现场亲历者如何将“自传记忆”的零碎经验性文本通过自主传播拼凑出完整灾害场景,总结其与专业媒体的职业创作共同构建“灾害拟像共同体”的多元意义。

一、打破“约哈里之窗”:灾害短视频的内聚焦叙事

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叙事话语》中提出了聚焦(focalization)概念并将其分为三个类型: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9]。内聚焦是指打破全知特权,从特定人物的视角出发叙述其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体验。人格化的内聚焦叙事对事件的陈述因富有主观色彩而具有鲜明的情感指向,但表意的可靠性常常为人物的价值观念和感知方式所左右。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报道多采用“全知视野”,即叙事者>人物,全面立体展现事件全貌的同时更加符合新闻价值的选择标准。而新媒体时代下的公民新闻打破了“传”与“受”的传播定式,采用“有限视野”即叙事者=人物或“视角外叙事”,即叙事者<人物的叙事方法补充完整新闻事实,与专业媒体分工协作完成报道。在山火和地震亲历者发布的灾害短视频的呈现中,第一人称叙事与影像结合的内聚焦视角在传递自我感受的同时充分还原现场真实感。叙事者面对灾害时的恐慌、焦虑以及救援成功时的激动、振奋等会随着传播链条的扩散不断增强并逼近受众情感阈值,通过打破空间距离、心理距离、时间距离等不同维度的拟像生产框架构建起与受众信息沟通、情感沟通、价值沟通的桥梁(如图1)。距离尺度下的协调沟通和逆专业化的媒介指征共同构成大众的灾害审视,随拍的多元化影像拼凑成完整结构的集体记忆,从而打破灾害传播的“约哈里之窗”,强化灾害的共同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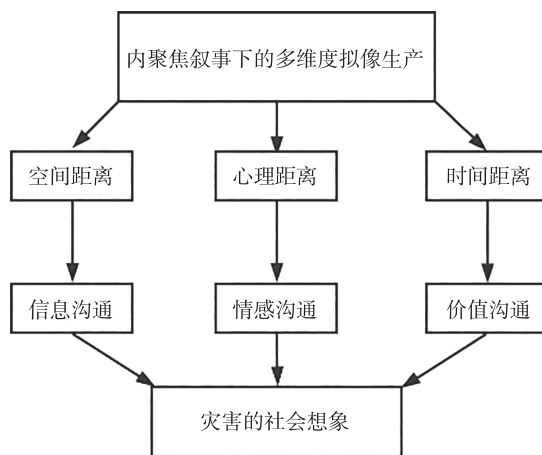


图1 内聚焦叙事下拟像共同体的建构框架

(一) 跨越空间距离连接信息沟通

1. 灾害感知的物质空间

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的空间三元结构论反对将空间视为社会关系演变平台的传统观念,而是将空间区分为“感知的物质空间”“构想的精神空间”和“生活的社会空间”三个层次。灾害发生的地理范围作为“感知的物质空间”直接影响人们对灾害的直观感受。重庆山火和土耳其地震的亲历者作为灾害感知的第一中介,在肉眼观测到的物质空间中明确感受灾难爆发时城市功能、出行、人口属性和社会经济等要素发生的巨大改变,量化灾害爆发后社会经济属性、居民活动模式,进而从“人地关

系”的角度总结身处的物质空间中的巨大变革。影像媒介与空间具有天然的联系,身处灾害中心的亲历者亲眼目睹灾害的爆发,以影像记录灾害的产生、持续、终结并与位于灾害边缘的参与者和超出地理感知范围的围观者进行信息沟通,共同在“精神空间”中建构灾害的“社会想象”。

2. 灾害构想的精神空间

网络社交平台最初传播关于重庆山火和土耳其地震的短视频大多具有“随拍性”,亲历者往往采用个人视角下的内聚焦叙事以直观简要的镜头画面展示自我感知与受众进行信息沟通。抖音 ID 为“稻野农场(雪莉姐姐)”的视频博主在山火爆发初期以灾害亲历者的个人视角抢先发布具体的灾害信息,通过影像记录第一时间将山火爆发现场和救援情况进行呈现(如表 1)。快手 ID 为“艾夏”的土耳其居民在拍摄地震时将其本人所处房屋的剧烈摇晃、情绪崩溃的家人以及慌乱跑向小区空地避难的居民作了直观呈现(如表 2)。短视频影像文本上传至社交媒体平台后得以快速传播,突破空间距离与围观者构建精神空间中灾害的共同体想象,拼凑出大众对于灾害的“认知图示”与“心理事实”。

表 1 重庆山火亲历者拍摄的灾情短视频一览表(部分)

发布平台	用户 ID	发布时间	视频标题	点赞数(万)	主要内容
抖音	稻野农场(雪莉姐姐)	2022-08-22 15:24	重庆北碚区发生山火	36.80	重庆连续高温干旱导致山火蔓延,农场的妇孺自发聚在一起给救援者们备饭
快手	汪汪不慌	2022-08-23 17:13	重庆不禁摩,我就以这种方式回报北碚火灾隔	47.02	以运送物资志愿者的第一视角记录灾害现场的坎坷道路、现场火势以及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
抖音	食都文化徐生	2022-08-25 12:13	离带现场,差人又缺水太辛苦了	6.94	灾害现场指挥人员摇臂呐喊缺水、缺人手,呼唤志愿者前来帮忙
西瓜视频	耍娃高峰会	2022-08-26 14:43	重庆市民热情欢送扑灭山火的英雄	3.67	重庆市民将扑灭山火归队的消防战士的车辆围得水泄不通,把西瓜、饮料等塞到战士们手中

说明:本样本采集来源于抖音、快手、西瓜视频三大平台,时间段为 2022 年 8 月 17 日—2023 年 3 月 1 日;由山火现场亲历者发布的“重庆山火”短视频,采集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 日。

表 2 土耳其地震亲历者拍摄的灾情短视频一览表(部分)

发布平台	用户 ID	发布时间	视频标题	点赞数(万)	主要内容
快手	艾夏	2023-02-07 05:16	土耳其中部 7.8 级地震,目前还在找住的地方,希望大家都能平安	30.72	地震现场,发布者所住房屋剧烈摇晃,小区空地上坐满避难的居民
抖音	酷昊和阿黎	2023-02-08 11:30	海外华人在土耳其连续经历多次地震	2.5	生活在土耳其的发布者和房东因为地震冒着漫天风雪紧急转移到安全地方
抖音	土耳其观观	2023-02-08 16:49	直击土耳其震后现场,希望废墟中的所有人都能获救	10.2	废墟下掩埋的小孩被消防员救起后抱着消防员痛哭流涕
抖音	雪茄哥	2023-02-11 13:25	土耳其灾难救援中	4.2	发布者帮助土耳其房东寻找在地震中失联的表哥,确认表哥平安后激动落泪

说明:本样本采集来源于抖音、快手、西瓜视频三大平台,时间段为 2023 年 2 月 6 日—3 月 1 日;由地震现场亲历者发布的“土耳其地震”短视频,采集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1 日。

3. 灾害生活的社会空间

灾害亲历者将“灾害感知的物质空间”通过影像上传至社交媒体建构“灾害构想的精神空间”,在不同自传记忆视角下的“灾害”在大众浏览、转发、二次创作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灾害生活的社会空间”。当旁观者通过灾害短视频参与到灾害信息的接收并进行二次传播——对灾害的感知姿态由“凝视”转为“参与”时,灾害的亲历者和旁观者便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连接互动,针对不同的风险议题完善建构灾害媒介记忆的整体合力与网络协同机制,在“社会空间”生产中联结对地方与世界的想象^[10],进而影响大众对于灾害的个人记忆、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

(二) 突破心理距离维系情感沟通

1. 灾害爆发的信息预警

在灾害与大众关系建构中,有学者研究发现疏密不同的心理感知维度受到时空距离、社交范围、群体差异和假设性等影响。灾害传播体系包含预警信息和情感抚慰两大版块,媒体作为中介方对灾害信息“工具性”和“情感性”两个维度的表述直接干预了受众对灾害的衡量与判断。集体共同经历的“突发性潜在创伤事件”通过媒体叙事被建构为社会性的灾难想象,社交媒体的即时传播模糊了“在场见证”与“网络围观”的时空界线,通过对“现实感”的创造和捕获构筑了受众对于现实情况的基础认知,尤其是在不确定性、扩散性和危害性持续增强的自然灾难时期,影像利用视听联动的方式将“远方的灾难”叙事化为“具体的事件”,满足社会基本信息需求和避险需求。在抖音等平台发布有关重庆山火和土耳其地震的短视频中充斥着大量灾害现场画面,如冲天的火光、烧焦的树木、坍塌的房屋以及危险的救援道路等,这些内聚焦的视觉化符号由身处灾害中心的亲历者重新收集、整合后编码为凸显风险沟通主题的可视化影像资料,提升风险表述科学性、通俗性的同时刺激公众的风险认知,扩大灾害预警效应。

2. 行动机制的情绪共享

大众除了基本的信息需求和避险需求外,更倾向于“情感上的表达与认同”^[11],媒介的参与可增强行动机制的情绪共享,“弥合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鸿沟”^[12]。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影像的内聚焦叙事展现个体的情感于公众视野创造开放交流的空间,临时组织特定灾害事件的“诠释社群”面向大众传递灾害信息的同时,也在社群网络中迅速传播恐慌、担忧等情绪,快速蔓延的情绪进一步刺激公众对于灾害的想象与认知,触发受众的共情机制并为此付出行动。作为中介方的灾害短视频通过内聚焦的手法和风险沟通对话的方式放大、共享情绪,拉近灾害亲历者与围观者的心理距离。接收到灾害信息和情绪的受众基于同情心以及观点认知开始站在亲历者角度并对灾害的整个过程做出思考,持续维系与灾害中心人员的情感沟通并认识到“岁月静好”下“他者”的“负重前行”。

(三) 克服时间距离强化价值沟通

1. 个体认知框架下自由选择的灾难记忆

灾害风险的应急管理处置坚持以社会公众利益为首位,媒介在多样态、多层级的风险沟通模式下主要议题始终围绕公众的信息需求与情感需求,核心在于满足公众的价值诉求。在灾害的媒介化呈现中,不同的呈现主体拍摄灾害视频的报道框架不尽相同。零聚焦叙事手法中媒体通过再现、遮蔽、凸显、创造等手法聚焦特定主题,价值选择以自身定位与公共政策密切相关。重庆山火短视频中内聚焦视角呈现的经验性文本更加强调自传记忆,提供更加逼真、连贯的视觉修辞符号,相关利益者们在社交媒体上因不同的利益诉求设置不同的灾害议题与受众进行价值沟通。如山火短视频中强调妇孺群众、摩托骑手、消防救援人员等某个特殊群体在灾害中做出的贡献,以及告知火灾得到控制的关键节点信息等。受众根据个体认知框架自由选择不同的“自传记忆”,并结合灾害爆发、持续、终结等关键时间节点拼凑成

灾害的完整想象,零碎的经验性文本与新闻媒体的公共创作共同构成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笔下书写“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

2. 价值观渲染目标下社会形塑的集体记忆

自2022年8月重庆山火爆发后,主流媒体、灾区公众、公共创作等主体对本次突发自然灾害事件进行了媒介化的“共时书写”,短视频作为中介方对灾害信息“工具性”和“情感性”两个维度的表述直接干预了受众对灾害的衡量与判断,通过将抽象的、碎片化的信息整合为具体、可视化的灾害记录结合人类主体性的媒介叙事方式成为理解、讨论灾害的重要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害短视频呈现出“重庆人民热情欢送消防救援人员”“北碚区建立山火救援摩托车博物馆”等议题,重申对过去灾害的追溯、对比和反思,并通过“保护森林植被”“弘扬骑士精神”等价值观的渲染作用于公众的精神世界,跨越时间纬度不断强化公众的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同时,延续灾害记忆的价值沟通亦是对个体与集体、家园与世界共同体关系的反复确认。

二、延伸“黑夜里的探照灯”:灾害短视频的价值转向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事件的报道——“新闻像黑夜里的探照灯”^{[13]278},即新闻机构就如灯塔,记者就是站在灯塔上的瞭望者,探照灯只能把一个区域照亮并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有限的区域发生了什么,但其他部分却处于黑暗之中。受到活动范围、社会资源等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大众传播媒介成为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但因信息传递者的立场局限性、审查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媒介通过议程设置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是一种“信息环境”而非完整的现实。在灾害传播中,移动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媒体机构独占话语权的垄断局面,将话语资源分散到社会大众给予其发声的权利,针对大众传播所形成的信息环境,受众除接收设置好的灾害焦点信息外,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参与个人视角下对灾害议程事件的事实补充,借鉴影像内聚焦叙事的广泛传播减少拟态环境对人认知、行为的制约影响,通过积极的行为机制改变被动接受状态从而作用于现实环境。

(一) 从信源到通道——灾害报道中传播功能的衍变

1. 调动话语组织权利传递灾害信息

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技术决定论”和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情境决定论”基础上提出“媒介场景论”,认为“情境就是信息系统”^{[14]4}。电子媒介将处于现实空间中不同身份的群体引入相同的社会情景,从而导致群体的社会角色和行为发生变化。灾害信息需求的本质首先是为幸存的“自我”服务,我国的灾害新闻报道模式经历了“党本位的单向度闭合式、事本位的多向度客观式、人本位的全息开放式”^[15]后,奠定了“灾害不是新闻,抗震救灾才是新闻”^{[16]51}的报道基调。传播功能观认为媒体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之一,需要调动话语组织权利向公众传递灾害信息,提供预警功能。大数据时代,网络与社交媒体不再只是虚拟的个体社交平台,而是演化为由公众、舆论、表达平台等要素构成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在突发性自然灾害中主导写作框架的动员主体变得多元而复杂,身处灾难中心的亲历者借助新媒体“节点平等、共享互助”的特点表达群体观点与态度的同时,呈现出区别于官方或主流媒体的灾难记忆与写作模式,在交流、协商、分享的过程中建构灾难的“社会想象”。

2. 组织社会物资向灾区提供资源支持

相较于传统媒体,灾害短视频借助新媒体“节点平等、共享互助”的特点,在平衡不同群体观点与态度的同时突破只呈现灾害的单一信源功能,从而寻求与社会大众建立“连接”。重庆山火短视频中“食都文化徐生”在参与救援工作时发现人员和矿泉水急缺的问题,随手拿起手机一边拍摄救援现场,一边口述急需救援物资,画面中抖动的镜头、杂乱的背景等内聚焦叙事下逆专业化的媒介指征迅速生成情感动员机制快速扩散寻求社会各界的援助。来自不同群体的灾害亲历者通过组合话语资源呈现出关于灾害的个体记忆,打造畅通的信息通道将“远处的灾害”和现场求助以短视频的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不仅满足公众的避险应对性信息诉求,更与全国乃至全世界受众形成“连接”,提高公众对风险沟通效果认可程度的同时建立科学共享的“生命通道”。

(二) 从宣传到响应——灾害传播中角色期待的转向

1. 垂直响应的信息汇集枢纽

在重特大灾害中,影响人们政治信任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为:灾难的严重程度(severity of disaster)、政府的救济工作(government relief effort)和信息的传播(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17]。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开始,我国重特大事故应急响应机制已从以往的“条块结合”式转向以事件为导向的“垂直响应”式,新闻媒体作为灾害应急响应的重要一环,机制的转变亦对其在灾害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新要求。在土耳其地震中,身处灾害现场的亲历者用视频介绍大雪封路导致救援力量无法汇集;重庆山火中有关“背篓运输队、摩托车、油锯”等相关主题的短视频,在介绍灾害现场情况的同时,发挥媒介作为信息汇集枢纽的功能传递出摩托车、油锯等资源急缺的诉求,这些信息的传递充分满足了社会大众关于灾害传播中媒体扮演角色的功能期待。

2. 积极践行的社会协同功能

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在转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社会系统》关于制度化的阐述中认为:人们彼此间支持或反对的行动都充分考虑了他人的期待并期望他人对自己所做的事予以反应,当这些互有的期望足够确定与持久就演化为标准,这些被期望的反应则为约束,人们由标准和约束指引时便在一起扮演角色^{[18]29}。垂直响应机制期待媒体构建以时间为节点,围绕灾害爆发初期、中期、后期展开信息沟通、协同治灾、悼念追忆等灾害传播响应体系,灾害亲历者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呈现不同群体视角下的灾害影像、共建“志愿者人员信息”在线表格和传播“救助文档”等互动方式与社会大众进行沟通,以信息响应、叙事响应、情感响应疏通信息传递渠道寻求支持与帮助。在媒介话语资源的支持响应下,重庆北碚山火现场短短几天内就召集了周边地区大量的摩托车骑手、油锯工人、志愿者等人力资源,身处遥远他方的土耳其地震围观者也通过邮寄、快递物资等方式共同参与救援中。灾害短视频结合不同群体诉求的补充性信源丰富其社会传播功能,在深层次上生产建设性的“灾害意义”满足新时期的角色期待,并借此缓解大众的负面情绪,积极践行社会性协同功能。

三、引导“单向度的人”:媒介纪念仪式凝聚社会共识

法兰克福学派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指出,发达的工业社会压制了人们内心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人类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成为“单向度的人”^{[19]67}。有学者研究发现,媒体是意识观念的权力掌握者,而大众关于灾害的经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媒介中介化的经验^[20]。关怀的中介伦理邀请大众更好地认识、理解和关心他人的困境,数

字媒体等技术的变革使大众可通过影像亲眼目睹灾害及其演绎过程,在“中介化”与“媒介化”纪念仪式的加工过程中连接灾害的传媒再现与社会公共生活^[21],借助无处不在的媒体和永久展示的拟像状态更为直接地“调解”公共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等问题,其对灾害的中介化意义可直接影响公众对灾害的理解,凝聚社会共识并引导其道德倾向。

(一) 直观化想象——拟像共同体与通达意义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提出“影像和影像叙述正在成为揭示我们视觉经验的秘密和传承社会记忆的有力手段”,这一论域的价值和思想表述愈发清晰显现^[22]²⁻³。随着互联网媒介技术的大众化普及,篇幅短小的视听媒介契合人们碎片化、快餐化的接受需求,逐步取代了传统媒体时代以文字为主的信息交流模式。学者彭兰认为短视频正在以“生活化”为底色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23]。不同群体自传记忆视角下的灾害短视频以生动的画面展示、碎片化的故事呈现和强烈的人物代入感拼凑出直观完整的灾害拟像共同体,记录与传播灾害的同时同化社会群体的情感与道德认知,通过视听语言和叙事手法整合人们对灾害的社会想象,并产生中介化连接与扩散、社会性协同与支持的通达意义。

1. 灾害的中介化连接与扩散

中介化最初指传媒如何生产组织传递话语的过程,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再现”(representation),在这个层面上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传媒的报道框架及叙事内容,将其视为连接传媒再现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概念,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所言:“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24]¹⁰⁵由此探讨如何利用媒介建构现实世界影响社会公众及其行为成为研究重心所在。罗杰·斯利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认为,“中介化”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对“驯化”概念的超越和发展,描述了制度化的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以及迅速扩张的万维网)参与的社会生活中符号循环的、根本的、不均衡的辩证过程。山火和地震具有突发性,传播通道的畅通事关救援的稳步开展与社会正常运转,灾害传播的中介化机制为“连接与扩散”,即救援信息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将诉求与社会进行连接协调。莉莉·乔利亚拉基(Lilie Chouliaraki)认为灾难的中介化是图像、媒介技术相关的话语资源在历史、政治关系等权利的要求下如何运用呈现方式、时空关系和代理关系再现灾难并影响受众对遥远灾难参与的过程^[25]。在此意义上灾害的中介化不只是一种社会表征,灾害传播作为传播技术与社会互相形塑过程中的一大实践,通过媒介“苦难中介化”的意义生产塑造灾害的社会想象,完成对现实社会的建构。新媒体时代下社会得以通过数字化渠道实现“再连接”,由主流媒体、市民等不同主体将受灾情况的碎片化信息发布在社交平台“扩音”,通过媒介“广场”的中介化作用创造连接个体信息节点的交流语境和传播场域,实现灾害信息的广泛传播和风险互助。中介化最新的研究方向在于受众的接收与响应层面,媒体作为社会情境中灾害中介化的积极转译者塑造出各种文本框架、理解经验与交往方式,在重建救灾援助的社会空间中创造新的可能。

2. 灾害的社会性协同与支持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风险社会中科学的三重意义分别为制造、识别和克服,现代性的断裂使得焦虑的共同性代替了需求的共同性,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形成了一种力^[26]¹⁵⁷。新媒体时代下人们更偏向于使用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获取风险信息,媒介作为灾害再现的“制造者”对灾害意义的生产方式将对个体的灾害感知产生不同影响。山火和地震的亲历者借助影像内聚焦叙事的第一视角,通过对灾害事实和价值的陈述制造“灾难图景”,引发社会共同焦虑的同时向超出地理局限范

围的网络围观者发送不同的“邀请”。媒介利用文化、价值符号以及科学论证打破地域的局限性,增强风险的可感知性与可计算性,在政府、灾区和社会大众之间组建多向交流的网络联系与共同治理风险的信任关系,目的在于使受众参与到灾害场景,并由此产生社会协同与支持性的行动后果。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和社会交往^{[27][570]},公众可更加灵敏便捷地感知社会风险,但由于语言符号的暧昧性和多义性,灾害信息的风险程度在受众的解码识别过程中会被不断放大或减弱,对风险的感知程度最终决定了人们克服风险焦虑和协同参与灾害救援的行为。灾害信息传播的开放性结构有助于构建节点化的灾害互助系统,针对灾区的实时求助及时扩散传播范围,“邀请”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灾害风险的防范与治理中。网友们在热情点赞、积极转发山火现场短视频的扩散过程中依靠媒介技术实现心理在场和情感依赖,在共同感知“远方的灾难”后自发性组织捐赠山火救援物资,从油锯、灭火器到矿泉水、方便面等,通过共情传播弥合风险情境中的社会断裂,增强社会与受灾人员的社会支持。

(二) 仪式与认同——灾害的真实建构与记忆强化

受到物理条件下时空距离和地理范围的影响,社会大众接收到作为符号价值载体的灾害拟像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白,实现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笔下肉身缺席下的身体符号消费。媒介在建构过程中运用掩瞒、同化等手段,使部分灾害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弭于日常生活之中,渐渐被人们遗忘。心理学中将“闪光灯记忆”作为裂散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接合,“闪光灯记忆”在建构过程中通过话语权的博弈不断加强或者弱化部分记忆,保证整体真实的基础上强化或削弱部分群体凝聚力以达到社会规训目的。作为载体的媒介在反复策划与展演中复原灾害事件的完整轮廓,完成数字化传播环境下“真实与建构”的理解转向,在延续和调整中强化集体记忆并构筑出独特的纪念空间。

1. 主体性记忆与灾害的“人道主义想象”

在数字化传播环境下,媒介通过对灾害事实进行有目的议程设置呈现相对性的“媒介化真实”,建构“超真实”的拟态世界,在真实与虚拟边界“内爆”的建构场域中媒介记忆成为连接灾害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键一环。有学者认为新闻事实并非全部的客观事实,而是一部分“具有新闻价值属性的事实”^[28],此次重庆山火和土耳其地震中灾害议题的多元化呈现印证了灾害新闻价值属性的定义正随着传播权力的下移变得更为多样复杂。新闻“产消者”在传播中通过“遮蔽”“去蔽”等建构手段左右事实“被反映”的过程,已成为数字媒体时代碎片化传播语境的常见之态,其“产消者”身份的出现也促使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从受众视角出发生产的相对真实,新闻真实理念也由“客观真实”向“对话真实”转变,由此衍生出“有机真实”“信任真实”等一系列拓展概念。土耳其地震新闻“产消者”来自不同群体的身份与属性决定了群体视角内价值关注点的参差多样,在反映地震事实时根据群体立场制定的新闻价值标准中更强调个人贡献与损失。同时由于群体间的总体服务目标都是围绕地震救援工作展开,在群体反映事实的过程中难免与其他群体视角交叉相融,在灾害事实的重复与互补中拼凑地震全貌,构建整体真实的灾害拟像共同体。宏观层面的新闻真实已远远跨越单纯认识论的范畴,迭代为集合受众心理、价值维度、情感取向的社会学问题,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无蔽”中的真相与非真相关联在一起,新闻作为“公共记载的知识”转变为对受众具有价值的“真知”^[29]。在此基础上灾害新闻“产消者”秉承“阐释的充分性”原则,在囊括本质真实的合理性和主流情感认知的合情度上建构事实,据此获得受众对灾害传播事实的认可,从而实现社会层面的“信任的真实”。

2. 科学化记录与灾害的社会启蒙

1925年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概念,集体记忆作为社会群体成员所共享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群体意识的基础,在成员间的彼此交流中建立相似性的经验、认知和情感,以增强群体凝聚力。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认为集体记忆是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操演”等周期性的呈现方式进行塑造和传承^{[30]71}。在重庆山火周年之际,后续拟像呈现中“春天一起去重庆植树”等纪念性仪式活动被设置为中心议题,蕴含拨开阴霾、重新起航的美好希望。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属性更偏向于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提出的“空间偏向的媒介”^{[31]40},爆炸性的碎片化文本在空间上无限延伸致使个体的记忆容量达到上限,公众将个体记忆的储存过程“外包”给媒介进行“选择性遗忘”。新闻媒体作为公共信息提供者成为保存、传播、建构和唤醒集体记忆的主体,印证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理念。在强调深度和反思的后灾害报道中,媒介的身份类似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立法者与阐释者”,在纪念活动和代际传承中强化对灾害事件的记忆图式框架,从而达到同化社会认知的最终目的。

四、结 语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反身性”(reflexivity)概念,核心含义是将数学集合的每个元素X与其自身相关联元素Y的因果关系进行重新表达。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通过科学建构将风险社会中不确定的风险自主转化为社会问题的意识过程即为“反身性现代化”。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全球化的趋势激发人类建立“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媒体如何利用反身叙事凸显灾害本质促进社会反思,最终改变人类对灾害的认知、行为模式是回应世界“不确定性”的重要举措。2003年SARS事件报道是国内媒体灾难反思转向的里程碑^[32],媒体开始以个体化叙事反思过往灾害报道中模式和制度的缺陷。但由于反思不及时、不深入和灾难叙事的流动性导致灾害报道的主体性历史缺失,未能从根本上增强自身提供决策依据可信度和行为推动力,公众的社会行为模式仍未在媒介的灾害报道中获得反省,无法与历史、当下和未来形成反思与对话。有学者指出,媒介可通过“持续反思”“主体性呼唤”“情感真实”“反身科学化”四个反身层次,以不同的叙事框架强化灾害报道对大众认知与行动的改变效果^[33]。未来的灾害报道可在真实情感的渲染中提供移情和反移情的动力,塑造共同的“灾害图景”并收获“同情的公众”,将社会引入到对灾害持续、深刻的反思之中,并在此基础上正视当前社会对灾害认知的匮乏和文化意义上的“现代性自负”,强化灾害日常化、专业化的“理性反映”。

回顾灾害并不是一种沉湎哀痛的止步不前,而是一种基于正视的向前迈进。重庆山火已被扑灭,土耳其也恢复了常态化,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渐渐弱化,大众对于灾害的生命感知与临场体验也逐渐埋在心底,信息存储介质的多样化和抽象化促使大众以惊人的速度遗忘依然鲜活的信息与场景,造成“集体记忆沉没”。记忆的实质是一种选择性“遗忘”,而遗忘的本质也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灾害亲历者与见证者构建的拟像共同体通过内聚焦视角再现灾害文本,实现短视频传播的中介化连接与社会性协同,借助媒介的纪念仪式扩展灾害的纪念空间,延长灾害记忆的时间轴,完成社会层面的意义生产与价值转向。纪念只是出发点,理解大众“自传记忆”零碎的经验性文本在建构拟像共同体过程中,将灾害信息转化为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笔下“惯习”的重要意义,籍此寻求超越传统的思考框架,并在规训与引导大众的同时实现对灾害的现代性认知与“拟像共同体”想象。

[参 考 文 献]

- [1] Crow D A, Berggren J, Lawhon L A, Koebele E A, Kroepsch A, Huda J. Local Media Coverage of Wildfire Disasters: An Analysis of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Policy Narrative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2017, 35 (5): 855.
- [2] 张梅兰, 陈先红. 灾难的社会想象: 媒体反身叙事与灾难的现代性反思: 基于新冠肺炎事件的报道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1): 53-54.
- [3] 沈正赋. 灾难新闻报道方法及其对受众知情权的影响 [J]. *新闻大学*, 2002(2): 44-47.
- [4] 袁鹏. 国内灾难新闻报道的新变探析 [D]. 南昌: 南昌大学, 2010: 13-14.
- [5] 金学怀, 吕竟. 中国灾难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 [J]. *华北科技学院学报*, 2008(4): 96-99.
- [6] 陈朝晖. 灾难报道的理念、方法与作用 [J]. *城市党报研究*, 2009(6): 28-32.
- [7] 杨丹丹, 岑丽芬. 论公众预测可能性在刑事法律解释中的适用 [J]. *法制与社会*, 2009(27): 341-342.
- [8] 朱嘉佑. 中美媒体灾难新闻报道中的跨文化因素研究: 以《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甲型流感为例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3-4.
- [9] 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 [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10] 黄世威. 抗疫时期国家的灾难叙事与共同体想象: 基于新华社 App“新视频”专栏的短视频 [J]. *青年记者*, 2022(8): 53-55.
- [11] 袁光锋. “国家”的位置: “远处的苦难”、“国家”与中国网民的“同情”话语 [J]. *国际新闻界*, 2018(7): 22.
- [12] 张萌. 苦难的媒介化感知: 距离、现实与情感: 以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为例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4): 44.
- [13] 沃尔特·李普曼. 舆论 [M]. 常江、肖寒,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14]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 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M]. 肖志军,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15] 董天策, 蔡慧. 我国灾难新闻报道模式的转变与突破: 以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J].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09(4): 6-7.
- [16] 王益民. 中国当代精彩新闻评说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
- [17] You Y, Huang Y, Zhuang Y. Natural disaster and political trust: a natural experiment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0, 6(1): 140.
- [18] C·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 [M]. 陈强、张永强, 译. 北京: 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 2005.
- [19]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 刘继,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 [20] Joye S. Research on mediated suffering within social sciences: expert views on identifying a disciplinary home and research agenda [J].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Reviews*, 2013, 38(2): 110.
- [21] 李艳红, 范英杰. “远处苦难”的中介化: 范雨素文本的跨阶层传播及其“承认政治”意涵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9(11): 57.
- [22]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M]. 方尔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23] 彭兰. 短视频: 视频生产力的“转基因”与再培育 [J]. *新闻界*, 2019(1): 34.
- [24] 苏珊·桑塔格. 关于他人的痛苦 [M]. 黄灿然,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25] Chouliaraki L. The mediation of suffering and the vision of a cosmopolitan public [J].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08, 9(5): 371.
- [26]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M].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27] 曼纽尔·卡斯特尔. 网络社会的崛起 [M]. 夏铸九,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28] 杨保军. 再论“新闻事实”:技术中介化的新闻事实及其影响[J]. 新闻记者,2017(3):22-30.
- [29] Park R E.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40,45(5):670.
- [30]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 [31]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32] 陈朝晖. 我国传媒灾难性报道的话语控制研究[D]. 武汉:武汉大学,2014:11-12.
- [33] 张梅兰,陈先红. 灾难的社会想象:媒体反身叙事与灾难的现代性反思:基于新冠肺炎事件的报道[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1):55.

Inner Focus Narrative-Value Turning-Memorial Ritual: Disaster Mimetic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Based on Disaster Short Video

Huang Yongjun Duan Mengh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how the “perceptual material space” of the “distant disaster”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communal meaning space” of the public through “video texts” in the media field, and to explore the basic mechanism of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their value shift in the process of medi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henomenon of short videos posted by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two natural disasters, the Chongqing fires and the Turkey earthquake, which have become “pop-up” in online social media. The short videos of the disaster shot from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of those who experienced the mountain fires communicate with the onlookers across space and time with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emotions and values through internally focused narratives, enhancing the perceptibility of the “distant disaster” and seeking social assistance and support in the process of mediated connection and diffusion, and realizing the dynamic negotiation and reflective r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dentity in the media ritual of commemoration. In this way, it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unity of disaster mimesis” jointly constructed with the professional creation of professional media by the independent dissemination of the fragmented empirical texts of the general public’s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into the public view.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unity of disaster mimesis” is also understood.

Keywords: mimetic communities; inner focus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values; media rituals; collective memory

[责任编辑:左福生]